

于化庭 著

中国共产党的 抗战历程

ZHONGGUO GONGCHANDANG DE KANGZHAN LICHENG

(上册)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于化庭 著

中国共产党的 抗战历程

ZHONGGUO GONGCHANDANG DE KANGZHAN LICHENG

(上册)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程：全两册/于化庭著.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 - 7 - 5488 - 3614 - 8

I. ①中… II. ①于… III. ①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史料 IV. ①K265. 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0534 号

出版人 崔刚
图书策划 张元立
责任编辑 史晓
装帧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250002)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16开
总印张 43.5
字 数 550千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198.00元(全两册)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531-86131736)

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为什么从卢沟桥事变开始中国就能够从局部抗战走上全面抗战之路？这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持民族大义，在民族危亡的危急关头毅然担负起团结救亡的历史责任，为倡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团结和凝聚起全民族各种抗日力量，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并积极组织抗日武装斗争，与东北抗日军民共同燃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烽火。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步伐的加快，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共中央依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适时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调整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中国共产党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推动全国各种抗日力量共同抵抗日寇大举入侵、实行全面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坚持团结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并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从而筑成了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血肉长城。这样，中华民族从此就走上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之路。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6年局部抗战基础上，又经过8年多的浴血奋战，历经14年的艰苦抗战后而谱写的胜利篇章。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中，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政治核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特别是在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在不同阶段所提出的政治、军事主张，对指导战争的全局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并领导抗日军民逐步开辟、巩固、发展了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引领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展历程，成为推动和指引全民族抗战逐步走向胜利的引领者和主要指导者。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中，在不同的抗战阶段所提出的政治、军事主张，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慎重稳健地驾驭抗战局势，全力确保预定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从而对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引领作用。因此，要清晰地把握抗日战争历史发展的主线，深刻揭示全民族抗战能够在艰难曲折中持续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程，这是抗战史研究中需要深入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程》正是为了回答和解决这个重大的抗战史问题而进行的初步研究和探索。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总的发展历程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基本阶段。为了正确把握每个战略阶段在战争实践中所经历的过程，还需要对各个战略阶段进行具体划分，以便对各个具体发展阶段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为此，《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程》把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抗战历程划分为十二个具体阶段（即十二章），对每个具体阶段的战争内容、主要历史事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导，分别展开研究和论述。从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开始，到瓦窑堡会议决定调整党的政治路线以及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确立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推动了每个具体抗战阶段的发展，都进行了相对集中的分析和探讨。全书力求通过对抗日战争中每个具体发展阶段的分

析和论述，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为夺取抗战胜利所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为了便于从全局上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程，全书在内容论述上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以及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变化，侧重阐述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不同阶段的政治、军事主张和在全局指导上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对全民族抗战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各章基本上按照历史顺序排列，均以所论述的中心内容为标题。比如“第一章：局部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该章重点阐述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概况，特别是瓦窑堡会议所确立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以及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正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局部抗战持续进行，而绥远抗战已进入高潮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在全国人民全力支持绥远抗战的历史洪流中，仍然顽固坚持大举“围剿”红军的政策，所以必然导致各界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普遍抵制。当时处在“剿共”前线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被迫实行兵谏，从而导致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全力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逐步实现了“逼蒋抗日”的政治目标，从而使西安事变成为中国从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历史转折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开始形成，这就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翌日，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通电。通电指出，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并号召全国人民、各地爱国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逐步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主力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后来也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推动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和发展起来，成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力量源泉。为了正确指导全民族抗战，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了洛川会议，确立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洛川会议明确

指出，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发动全国各阶级、阶层、政党和社会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之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并广泛动员和组织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努力从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洛川会议号召共产党员要积极地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成为团结抗战的核心。

洛川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力求推动国民党当局改变片面抗战的指导路线，但是国民党当局始终拒绝改变其片面抗战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只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全民族抗战中自行贯彻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八路军各部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积极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不仅积极担负战区作战任务，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形成了忻口会战前期的有利战场态势，而且在太原沦陷后全力推动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新的阶段，从而逐步改变了华北的抗战形势。随着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和华北敌后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的相继建立，在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陆续创建了一批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相对稳固的敌后抗日阵地，进而逐步开辟了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华北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明显改变了全民族抗战的战场格局。

在抗击日寇向华中方向进攻期间，中国共产党重视正面战场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等重大作战行动，积极地宣传、支持与配合，通过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组织各种形式的支前队伍，形成了全民族共同对敌的抗日洪流，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在徐州会战结束后，毛泽东通过深入总结全民族抗战十个月的基本经验，全面分析了全民族抗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写出《论持久战》这一理论著作。《论持久战》的发表，对坚定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指导全国军民有步骤地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随后的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保卫武汉做了积极努力，中共中央不仅明确了保卫武汉的共同任务，而且确立了保卫武汉的指导方针，并指导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军民给予战略上的有力配合，从而使武汉会战达到了进一步消耗和牵制进攻之敌的战略目的。在武汉会战后期，中共中央成功召开了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对抗战战争的发展历程，甚至对整个中国的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维护了全党的团结，基本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并明确了全民族抗战进入新阶段之后全党所面临的任

务。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逐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步面临敌、顽夹击的复杂斗争形势。在此期间，敌后抗日军民不仅要适应战争重心转向敌后战场的新局面，而且要面对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以及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甚至掀起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面对敌后战场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确立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基本方针，正确指导敌后战场军民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给予必要的反击，但始终坚持以抗日斗争为主要任务。华北敌后战场军民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八路军总部迅速组织实施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大规模交通破击战沉重打击了华北日军，不仅粉碎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囚笼政策”，而且在全国抗战形势处于低潮、投降派活动相当猖狂的时候，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对抗战的全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百团大战后期，国民党顽固派又把反共摩擦的重点转向华中敌后战场，并在1941年1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致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遭受重大损失。中共中央在全面揭露蒋介石集团制造皖南事变、严重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并严厉驳斥蒋介石对新四军的诬蔑之后，表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不动摇，在军事上严守自卫的克制态度。这样，皖南事变后尽管国共两党关系已处于破裂的边缘，但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的善后工作中，始终坚持以全民族抗战大局为重，坚持正确的立场与合理的主张，从而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国内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蒋介石集团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蒋介石集团被迫暂缓了“剿共”行动。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事变后就被打退了。

在皖南事变前后，侵华日军已经加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力度。由于侵华日军投入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用于进攻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所以造成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逐步进入严重困难时期。这个期间，日军对敌后战场实行以“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为主要内容、以“扫荡”“蚕食”为主要手段的疯狂进攻，甚至推行极端野蛮的“三光政策”，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力量、彻底摧毁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而造成敌后抗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为领导敌后战场军民战胜各种困难，中共中央确立了战胜严重困难的基本方针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极为艰苦的对敌斗争环境中，深入贯彻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始终顽强坚守敌后抗日阵地，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地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敌后战场军民长期抗击着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的持续进攻，使敌后战场在严重困难时期逐步成为牵制敌人数量最多、对敌作战最频繁、取得战果最明显的抗日战场，进而成为全国抗日主战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41年、1942年期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就大量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兵力，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总共作战达4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共27万余人。而这个期间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仅抗击着25%至37%的侵华日军兵力，正面战场基本保持消极防御的态势。

随着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先后爆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成员。由于中国敌后战场军民长期抗击着日、伪军的主要兵力，并通过敌后抗日阵地的顽强坚守盘活了抗战的大棋局，明显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从而使正面战场能够相应调整兵力部署，对日军的局部性进攻给予必要的反击。这对于提高整个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这时的中国敌后战场已经成为重要的反法西斯战场。

敌后战场军民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不仅粉碎了日军全力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而且也逐步发展壮大人民抗日力量，进而不断改变敌后战场的斗

争态势和敌我力量对比，逐步度过了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有利变化的条件下，为了推动中国时局好转，中国共产党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并促成了1942年开始的国共谈判。尽管这次谈判没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但缓和了两党关系。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对敌后战场斗争形势的日益好转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的转折性变化，却表示出极大的担忧，担心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将威胁他们的独裁统治。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决定在抗战形势对他们相对有利的1943年再次发动新的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从1943年春就秘密做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定，并在反共宣传舆论的配合下逐步完成军事部署。国民党顽军胡宗南部在当年六月、七月间，已经启动了闪击延安的军事行动。在此危急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迅速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内战阴谋，从而引起全国人民对爆发内战的高度关注，陕甘宁边区军民也积极做好应对内战的准备。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集团不得不暂时罢兵。而1943年秋季以后的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在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开罗会议后，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势不可当，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也就被再次打退了。

进入1944年，国共两党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尽管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1944年开始的新一轮国共谈判，但在国民党当局坚持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双方的谈判未能取得进展。随着敌后战场1944年的局部反攻已成燎原之势，而正面战场却连续遭受豫湘桂大溃败，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军队的豫湘桂大溃败引起了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和愤怒，也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及其推行错误政策的严重危害，大后方的进步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代表在国共谈判中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提案，很快成为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一面旗帜。随后，在美国驻华使馆的介入下，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一直持续进行，直到1945年5月国民党当局停止了这次谈判。

在敌后战场普遍展开抗日局部反攻之后，毛泽东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开始筹划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并形成了抗日反攻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明确

提出“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反攻责任，要求敌后战场军民必须做好抗日反攻的全局性准备。毛泽东指出，在抗日反攻中我们“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必须抓好两个方面的全局性准备工作。第一，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第二，要“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要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此后，敌后战场军民在不断扩大局部反攻规模的同时，也在全力做好转入抗日全面反攻的准备工作。

随着敌后战场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驻华美军高层注意到敌后战场在抗击日军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美军与敌后战场直接建立军事合作关系的巨大价值，进而推动美国最高当局于1944年春做出向延安派驻军事使团的决策。中共中央决定抓住有利的战略机遇，邀请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使敌后战场与盟军直接建立起军事合作关系。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毛泽东希望这个美国军事观察组能够成为敌后战场与美国发展多方面合作的桥梁。尽管敌后战场军民对美军观察组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使之较好地履行了所肩负的使命，但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在进行调整。美国政府逐步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预期中的敌后战场与盟军大规模军事合作未能实现。

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必然对中国抗战形势产生直接影响。在美国政府明确推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后，毛泽东就指出这种对华政策将造成严重后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果然，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就确立了一条反对民主、坚持独裁和准备内战的反动路线。在这条反动路线的指引下，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六大”上更加露骨地提出，在军事上实行反共内战方针。蒋介石还对参加国民党六大的军队代表专门进行了内战动员。在国民党“六大”之后，国民党顽军就加紧进行反共内战的准备，不断向解放区“收复失地”，持续发动较大规模的军事进

攻。国共两党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迎接抗战胜利的。

由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大片的解放区，所以敌后战场在1944年后也被称为“解放区战场”。进入1945年，尽管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仍处于战略防御态势，但解放区战场广大军民在普遍展开局部反攻的基础上，继续发动更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成功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革命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也是为解放区战场从局部反攻发展到全面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准备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路线指导下，解放区战场适时转入抗日战争全面反攻阶段，并与同盟国军队配合作战，共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45年5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取得了完全胜利，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日本法西斯面临着最后的决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决战阶段的战场作战，主要包括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和中国解放区战场转入全面反攻。在苏联1945年8月8日晚对日宣战后，中共中央8月9日就做出解放区战场立即转入全面反攻的战略决策，解放区战场各大战略区迅速展开全面反攻作战。解放区战场的抗日全面反攻取得了重大战果，并一直持续到全民族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回顾中国抗日战争14年的历程，其中从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全民族抗战时期就长达8年，这是中国人民英勇战胜日本侵略者最重要的抗战历程。尽管全民族抗战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抗战阵营内部多次出现波澜迭起、险象环生的形势，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依然维持了下来。因此，这8年的全民族抗战性质未发生改变。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坚力量。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军民始终贯彻落实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基本方针不动摇，同各爱国党派、爱国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共同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大局。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程》一书，是从中共党史的角度揭示抗日战争发展历

程的抗战史通俗读物，也是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做出重大历史贡献的党史教育普及读本。本书通过论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情况，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各阶段的正确指导，进而揭示出全民族抗战能够在艰难曲折中持续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因此，本书的内容能够为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提供比较充分的历史资料和相对系统的宏观性研究成果。

本书在语言上力求通俗化，尽量增加知识性和可读性。但在对主要战役、战斗的介绍、分析时，使用了一些比较简明的军事术语。在军事术语的使用上，作者尊重当时的军语概念，比如，日军没有战役的概念，只使用“作战”的术语；国民党军队当时也不用战役的概念，而使用“会战”的术语。本书使用原来的军事术语，便于读者查阅、对照国内外的相关历史资料。

由于全民族抗战涉及的内容极其丰富，范围也极为广泛，而笔者对相关材料的掌握还不够全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相对有限，尽管力求引用最新研究成果，并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程》一书仍然是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还只是论述了一个简要的抗战历程，而且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本书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的有关专家和济南出版社的领导、编辑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于化庭

2018年春于解放军国防大学二号院

目 录

[上册]

第一章 局部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
一、九一八事变后推动各地局部抗战	2
二、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	16
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战略举措	24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方针的调整及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42
五、绥远抗战、蒋介石推行内战政策及西安事变	53
六、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61
第二章 全国抗战爆发及中共中央确立全面抗战路线	71
一、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72
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80
三、中共中央确立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	92
四、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军事战略	103
第三章 八路军出师抗日与华北敌后游击战争	111
一、八路军出师抗日与太原会战期间担负的作战任务	112
二、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26
三、八路军在敌后抗战中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134
四、华北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及敌后战场的开辟	145

五、东北敌后战场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发展	154
第四章 重视抗击日寇向华中方向的进攻及《论持久战》发表	161
一、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及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	162
二、上海、南京沦陷后的抗战形势及开封军事会议	175
三、徐州会战及其对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	185
四、毛泽东适时发表《论持久战》	195
五、新四军出师抗战及实施战略展开	203
第五章 为保卫武汉而共同努力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215
一、明确当前的共同任务及确立保卫武汉的指导方针	216
二、武汉会战概况及广州迅速失陷	223
三、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积极配合武汉会战	235
四、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及其深远影响	245
第六章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领导敌后战场的复杂斗争	257
一、武汉会战后战争双方进行重大战略调整	258
二、敌后战场军民贯彻抗战新阶段的军事战略方针	266
三、华北敌后战场的反“扫荡”、反摩擦斗争	280
四、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八路军全力对日作战：组织实施百团大战	296
五、华中敌后战场的抗日、反顽斗争及苏南新四军挺进苏北	305
六、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及中共中央的应对策略	319

第一章

局部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建立



会宁会师旧址

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 14 年抗日战争期间，始终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为夺取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尤其是在中国局部抗战开始后，日本侵略者不断扩大侵略的规模和范围，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毅然担负起团结救亡的历史责任，适时调整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倡导和持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各阶层群众的广泛拥护，从而逐步团结和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日力量，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实现了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一、九一八事变后推动各地局部抗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除少数部队做了坚决抵抗外，近 20 万东北军主力不战而退，造成大片国土沦陷。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抗日意愿，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反对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迅速发表了进行武装抗日的有关决议和宣言等文件，直接推动、支持和领导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并积极支持中国军民在沦陷区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不仅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和局部抗战的兴起，而且促使局部抗战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紧密配合，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为凝聚起全国各种抗日力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支持和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支援了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等局部抗战，并参与组织领导了察哈尔抗战。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一再妥协、退让，各地抗日军民先后进行的局部抗战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敌人的力量，迟滞了敌人的侵略步伐，却未能达到制止敌人侵略和收复失地的目的，甚至遭到国民党当局